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NEWSLETTER

5

GDN

第一卷 / 第五期 / 2011.7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真实乌托邦

Erik Olin Wright

发展做为正义

Kalpana Kannabiran

面对水资源不平等

José Esteban Castro

- > 全球劳动的辩论
- > 纪念Robert Merton
- > Catalonia的年轻社会学家
- > 动社会学在中东
- > 历史一隅：ISA制度的演变
- > 西班牙革命中的社会学
- > 给主编的信：滚牛粪
- > 编辑介绍：Paulista编辑团队
- > 人权：英国的反恐案例



> 主编的话

与命定论和本质论不同，社会学认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第5期的全球对话中以“真实乌托邦”的讨论起头。这个概念是Erik Wright所发展出来的，用来指涉那些实存、挑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其他的文章也围绕这个主题：Kalpana Kannabiran以印度的个案去讨论发展与正义；Teresa Sordé和Tatiana Santos则描述西班牙参与式民主的尝试；José Esteban Castro则探讨拉丁美洲的水资源正义。其他杰出的劳动社会学者从不同的方向来处理“真实乌托邦”的概念，同时也借着探讨“反霸权的全球化”概念，延续了我们一直在进行中的“全球社会学”辩论。因此，Edward Webster讨论了南非的全球劳工运动，潘毅和Enrique de la Garza则是分别讨论了中国和墨西哥的例子。Farid Alatas报导了在Tehran的中东社会学会议，Ana Vidu则是介绍在Barcelona举行的青年社会学者会议。此外，Nadia Asheulova和Jaime Jiménez则提及了RC23对科学社会学大师Robert Merton的纪念会。其他的特别专栏还包括了：假借反恐之名对学术自由进行迫害的事件，ISA双委员会制度的历史，以及非洲的滚牛粪抽样。最后，我们还开启了一个新的专栏：介绍我们世界各地的编辑团队。在此也诚挚欢迎来自Tehran的年轻社会学家编辑群，他们负责波斯文版本的全球对话，这是我们的第10个语言！

在Facebook和ISA的网站上可以找到全球对话。

ISA website

facebook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2
真实乌托邦与全球社会学	3
发展做为正义：印度的真实乌托邦	5
面对拉丁美洲的水资源不平等	8

> 全球劳动的辩论

南非观点	13
中国观点	15
墨西哥观点	17

> 会议

动社会学在中东	7
Catalonia的年轻社会学家	10
纪念Robert Merton	20

> 特集

历史一隅：ISA制度的演变	7
西班牙革命中的社会学	11
给主编的信：滚牛粪	18
编辑介绍：Paulista编辑团队	19
人权：英国的反恐案例	21

> 編輯委員

编辑委员

主编：Michael Burawoy

执行编辑：Lola Busuttil、August Bagà、Genevieve Head-Gordon

副主编：Margaret Abraham、Tina Uys、Raquel Sosa、Jennifer Platt、Robert Van Krieken

编辑顾问：Izabela Barlinska、Louis Chauvel、Dilek Cindoglu、Tom Dwyer、Jan Fritz、Sari Hanafi、Jaime Jimenez、Habibul Khondker、Simon Mapadimeng、Ishwar Modi、Nikita Pokrovsky、Emma Porio、佐藤嘉伦、Vineeta Sinha、Benjamin Tejerina、伊庆春、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Sari Hanafi、Mounir Saidani

巴西：Gustavo Taniguti、Juliana Tonche、Pedro Mancini、Fabio Silva Tsunoda、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Andreza Galli、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印度：Ishwar Modi、Rajeev Gupta、Rashmi Jain、Uday Singh

日本：芝真里、塩谷芳也、姫野宏輔、高见具店、速水奈名子、岩馆豊、池田和弘

西班牙：Gisela Redondo

台湾：何经懋

伊朗：Reyhaneh Javadi、Saghar Bozorgi、Mitra Daneshvar、Shahrad Shahvand

可以告诉我们如何迈向另外一个世界的社会转型理论。对于真实乌托邦的研究则是满足上述第二点的方法之一。

真实乌托邦中所指的“乌托邦”，意味着针对现今主宰着我们内心对于人类公平世界想象的社会制度，提出其他可能的选项。这基本上是个道德议题：去思考什么判别制度是否符合正义的道德判准，以及替代性制度的安排是否符合这些价值。而所谓的“真实”，意味着去探讨支配性制度的替代选项，且聚焦在非预期性后果和自我毁灭的问题上。我们很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严谨且可行的替代模式，严肃处理实际的制度设计问题，以及留意实践理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研究真实乌托邦隐含着发展一种“可能性”、而不单单只是“现实性”的社会学。然而，我们要怎么避免只是不切实际地唱高调呢？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辨识出那些实存的社会制度，指出它们是如何和既有的支配逻辑背道而驰、并体现了解放和揭示了实现乌托邦的无限可能。因此，这里的研究重点在于检视这些个案如何成功，如何促进了人类的福祉；另外，也要去分析其限制、困难、以及未预期的后果，并且去了解进一步的发展潜力和可能推展的方式。这样的研究有可能是种引诱，让人毫不批判地就为大有前途的试验计画欢呼喝采；也可能导致危险，让人变得犬儒，总是把缺陷视为真实、把潜力当成幻觉。

但是，对那些富有启发性之经验个案的研究只是真实乌托邦计画的一部份。过度集中在经验案例上，会窄化了替代可能性的意义，限缩到特定、微观的社会组织制度上。我们仍然要理解在巨观层次上、整体社



真实乌托邦与全球社会学

by Erik Olin Wrigh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Erik Wright是美国社会学会的候任理事长，其任内的主轴将会是“想象真实乌托邦”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这也正是他一系列新书的书名。我派了一个任务给他：在1500字内解释何谓真实乌托邦，以及和全球社会学的关系。大家觉得他有达成任务吗？

“真实乌托邦”这个概念来自于批判社会学的基础宣称：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里，人类历经了各种形式的苦难，繁荣景象的背后也有许多缺陷，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所导致。

贫穷不是本质，而是现实社会组织权力不平等安排的后果。这样的宣称批判社会学提供了三个核心任务：第一，对这些问题的社会根源进行诊断；第二，去设计、连结替代性的制度与结构；第三，发展那些

会系统运行的意义下，“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句话所代表的真正含意。之前这样的讨论总是围绕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性的对立概念上。而探讨这种系统层次的替代性选项需要更多针对各种不同社会与经济结构模式的抽象理论分析。一个完整的真实乌托邦社会学必须整合具体的经验研究，提供想象解放的可能，以及抽象的理论探讨，让我们认识替代系统的运作逻辑。

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我很难用只字片语去完整道尽这项计画。我们能作的，是去丰富这个构想的内涵。以下将借着检视两个经验个案来进行。这两个案例(若仍然不是很完整)体现了一种基进、平等的民主制度。第一个例子来自全球南方，第二个来自于全球北方。

> 都市参与式预算

直接民主的概念意味着让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订。这种想法而在当代社会中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因此，参与式预算的构想就无疑地是一种尖锐的挑战性尝试。故事是这样子的：1989年，在巴西的Porto Alegre，参与式预算意外地被发明了。在1988年末，历经了漫长的军事独裁，总算转型到民主政治之际，左翼的政党虽然赢得了市长选举，不过，议会席次未过半数，所以面临到了未来4年将无法推行任何进步改革的窘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翼政党问了一个经典的问题：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en)? 他们提出的对策，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参与式预算。这是一种由一般市民来参与的预算制订模式，采用不同于传统由上而下的方式，将Porto Alegre划分成数个区域，每一区都设置有预算参与委员会。此外，还有数

个全市规模的预算委员会，涵盖各种主题，像是文化、公共运输等。每一个议会的的工作就是去制订出具体的预算计画，特别是基础建设方面的。每一位市民都可以参与制订过程和投票，并在正式批准这些区域和主题预算后，每个区域委员会选出一位代表参加全市规模的预算委员会，为期可能长达数月之久，直到所有代表一致通过全市的预算计画。

从1990年早期开始，参与式预算就在Porto Alegre顺利运作了。其中几年预算制订的过程相当活跃，有上千人参加了全市的预算审议；然而，除此之外，特别是政府经常支出的额度有限时，参与的人数就减少了。但无论如何参与式预算还是激起了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并将全市的预算支出花费在贫穷和弱势族群上，而非菁英阶级。总体来说，这项计画已经为民主深化开启了崭新的可能。

在Porto Alegre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的那几年，世界各地有超过1000个的城市在试验类似的计画。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来说明真实乌托邦的创新构想如何从全球南方拓展到北方。

> Wikipedia

请大家想象一下：在2000年，Wikipedia尚未被发明的年代，某个人提出要在10年内完成一个有350万个英文条目的百科全书，而目标是日后要成为当数百万人想要查询某个基本资讯时第一个会去的网站。然后，我们假设这个人提出了生产和使用百科全书的制度：(1)条目由全世界数十万人无偿地写作；(2)任何人都可以编辑修改任何的条目；(3)这个百科的使用毫无任何身份限制。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试想，数

十万计的人一起合作编写一项高品质的条目，不拿任何薪水，使用不需付费，这彻底违背经济理论所说的任何合作都必须有金钱诱因才能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运用。Wikipedia是一个绝佳的平等主义、反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与分享的例子。它以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为基础，以水平互惠、而非垂直控制的逻辑组织而成。并且不到10年内，就把源自于18世纪百科全书的商品市场给击垮了。

Wikipedia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一种非资本主义、非市场生产制度的例子。其在这个数位时代浮现：点对点、合作、非商品化的生产。这种新型态的生产模式，和其他数种资讯经济的真实乌托邦有着密切的关连，像是创用计画(creative commons)、公共版权(copyleft)、开放原始码(open source software)。我们将可以看到的是这样的形式如何对资本主义的智慧财产权概念带来冲击，或是在这资本主义体支配制中创造出更多元的经济形式。

以上两个例子阐释了社会替代选项的概念，以及如何不同于当代的权力结构与不平等组织。这些例子都为我们社会更平等与民主的想象提供了崭新的思考，也反映出了追寻人类社会福祉的乌托邦渴望。不过，我们仍然在找寻实现这个渴望的具体方法。总之，了解世界上存在着诸多的可能性，正是真实乌托邦计画的核心要旨。

> 发展做为正义： 印度的真实乌托邦

by Kalpana Kannabiran, Council for Social Development, Hyderabad, ISA 计画委员



Adivasis 的群眾運動

在地度，种种有关发展的论述，内部歧异性都很大，大到如同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一般（虽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如此的精力旺盛）。我不打算按照这个论述的逻辑，而采用从我和Adivasi这个社区一起工作的经验、一同参与宪法和法律制订的经验中所得到的灵感开始。

首先，我们有很多种“发展”的方式。这个概念最具支配性的词汇，是“大水库”、“生态恶化”、“绿色革命”、“经济成长”、“采矿”、“军事占领”、“原住民知识的盗用”、“自由贸易”、“全球化”等。某种程度上，“发展”的实践和反抗被其巨大的力量所掩盖。这些实践和反抗，是一种“另类发展”，像是永续经营、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和传统知识系统的培育等等。这里等一下所提到的例子虽然规模不大，但是都是在印度具有决定性的一种努力，努力为了生存、发声、被看见，以及努力对抗POSCO、Vedanta、Narmada、Po-

lavaram、Chhattisgarh和Manipur等。

若用这个另类发展当作讨论的起点，我们会发现：多元主义是讨论的核心概念。仔细检视这些为了生存和尊严的奋斗过程，就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正义很难实现。然而，把发展视为一种自由的形式，也是很重要的，而且要谨慎地去对应到各种发展可能的方式（请参见Martha Nussbaum和Amartya Sen丰富的讨论）。此外，也必须以其历史与社会的特性去重新检视对自由造成的威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社会秩序如何为开发、未开发、不自由带来危害（请回想一下那些古老的辩论）。

在Adivasi社区中，有超过500个部落被印度宪法的第342 条文所认可，这个区域横跨了除了Punjab、Haryana、Delhi、Pondicherry和Chandigarh的全印度。印度的中部和东北部拥有最集中的Adivasi社区，人口超过了North East、

>>

Lakshadweep、Dadra、Nagar Haveli的50%。其中约有75个部落被官方称为原始部落(Primitive Tribal Groups)，很显然这是依照居住地、经济、人口规模而定，也充满了刻板印象。

反歧视和争取自由权利的运动在Adivasi有很大的回响。游牧和半游牧的部落在狩猎、采集食物、耕作等方面与要有移动的自由。被印度宪法的Schedules V和VI所认定的部落也需要拥有在这个区域中免于被驱逐之恐惧与权利。这些人若居住在其他地方，就没有上述宪法权利的保证，即使这种情况可能已经传递数代了，情况仍然如此。

在这些案例中，自由权以领土权来定义，也就是其居住的土地是固定或是移动的，但也授与人民对其的特殊认同，让不同的生活模式成为可能。不论在农民或是非农民社区，与土地的关系已经成为了Adivasi和法律与宪法的抗争的核心。所以几个主要的胜利都是在法庭内争取而来的。

因为大部分的Adivasi社群都住在森林中，所以居住的议题不仅仅局限在土地上，也延伸到整个森林的范围。此外，此一社群的主要关怀也不只是生计或是居住而已，也拓展到生态、环境、保育、知识系统的革新等等，也就是森林的所有政治经济学面象。由于他们的生活和森林密切相关，所以也当然是野生动物保护和森林保育的重要团体。

在森林中的位置导致了对于统治、自主、自治、森林权等相关的抗争，对抗新自由主义发展国家所定义的主权概念。然而，这是不折不扣的自主性防卫，用Adivasi的话来说，就是“maava naate maava raaj”(吾之土地，吾之规则)，也在印度宪法的Schedules V和VI中被载明，特别指出了保护Adivasi的土地，提供语言、工具、策略去对抗那无情、霸权、暴力的国家主权，防止其任何限缩宪法权利的企图。

Adivasi也渐渐发现他们总是与最高法院的强力游说在对抗，这对他们来说，无论在物理或是社会空间的距离上都有着很难被超越的障碍。然而，虽然大众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很天真，不争世事，但是他们已经坚决地宣称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力，而且这样的权利是世代相传下来的。

Panchayats Extension to the Scheduled Areas Act of 1996 (PESA) 和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Traditional Forest Dwellers (Recognition of Forest Rights) Act of 2006 (FRA)两个法案，是设计用来

管理和统治政治经济的。而这也变成是Adivasi在抗争和审议时的魔法仗。重要的是，这些法案的辩论，代表的是一种普遍、甚至是转型中的宪政主义的实践。

对Adivasi社群来说，要享受到印度宪法保障下的反歧视权利，此权利必须转译成从内部殖民而来的自由。此一权利是在1950年宪法生效后被确立下来的。也因此很适合放在PESA和FRA的宪政道德架构下去看待。对于Ambedkar这样一个人民和宪政权利最主要的防卫者来说，和平的民主宪政工作是需要一个管理的模式，适合于且相当于宪法架构。

现在我们可以重述我们的问题：歧视如何以正义之名把某些群体排除在发展之外？这牵涉到歧视多个层级的脉络，各种压迫交错复杂的多元特性，在建构发展的概念时，必须好好的思考该如何处理。假设歧视越来越多、越来越具针对性，以及自我持续的倾向，发展的这个概念虽然在过去多数时候是反宪政主义的，但是现在不应该维持这个方向，反而要加入且产生自己的工具。虽然正义会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以宪政主义去推动发展和正义的紧密关连，是很有用的。宪政主义的那一个面象和是和发展作为正义的这个概念密不可分的？若我们同意：没有偏见的多元主义和多样性是追求理想与正义社会的驱动力，而且对于发展这个概念来说很重要，那么，宪法会怎么对这样的断言表示意见呢？

此一宪法的方式将发展视为是一种有限的努力，在这之中，正义和自由在空间和社会上被限制在民主国家里，而这个国家有责任去保护人民免于遭受侵害、分配资源和实现个人能力。而这些并非一个政府与生俱来，心甘情愿要负的责任，而是一个国家没有理由拒绝的责任，特别是当政府遭受到来自于公民自由和Adivasi权利运动的压力时，更该如此。



> 历史一隅

国家学会和
研究委员会

by Jennifer Platt, 出版副会长

国家學會是ISA的集體會員，研究委員會国家学会是ISA的集体会员，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mmittee)亦是，两者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他们的功能至今已经有所改变。当ISA在1949年成立时，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底下，采用联合国的会员国架构。那时很少国家有社会学会，不过，此一景象很快就改变了。到1959年为止，已经有35个学会加入ISA。ISA的管理委员会(Governing Council)有纳入各国学会会员的代表权，并且从中选出组成执行委员会(EC)。当时的执行委员会下设置有一个次级研究委员会(Research Subcommittee, RC)，去决定与社会阶层化或社会流动相关议题的工作执行。而到了1950年代末，RC的议题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例如家庭等，成立了许多次级的小型工作小组，并邀请会员制，每个国家不超过2个会员。

研究委员会向来被认为是积极的国际主义者，因此也较广为人知。1970年ISA展开了重要的组织变革，将RC开放了，引进了个人会员，而且RC的成员不再只是来自于管理委员会。后来Research Council成立了，并且有4个EC的会员加入11个国家会员代表。开放后的RC组织变得更加庞大，加上有些会员淡出了原本的领域，因此联合的RC(joint RC)就变得比较不那么重要。总之，各个RC渐渐地在管理层级上越来越重要，到了1994年，现行的组织架构正式确立了，国家学会和RC的规模都到了符合了议会(Council)的标准，可以投票选举EC半数的会员。

当时的RC可以选出研究副会长，但是这也让国家学会会员产生了些许的不满。所以2002年设置了国家学会副会长一职，第一任的副会长是Sujata Patel。这个新制度让国家学会更加活跃。迄今两届的副会长发展出了一套以满足在委员会和世界大会间需求的会议模式，这让ISA的事务更有效率、参与更加广泛，也让ISA的治理架构与知识的模式产生关连，最近几年的集体发表就是这种二元结构的最佳例证。 ■

> 纪念Robert K. Merton

by Nadia Asheulova, Center for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Science Studies, St Petersburg Branch,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RC23成员、Jaime Jiménez,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执行委员

2010年7月是Robert Merton的100岁冥诞。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我们纪念他，除了是因他的诞辰之外，也由于他对于开启了科学社会学的这个次领域，功不可没。1966年Merton和Joseph Ben-David一同赞助了ISA的RC23之成立。RC23的领域正是科学(与科技)社会学，而Merton也成为1974年的会长。他在1970-71年也是执行委员。Merton教授于1910年在费城出生，父母是乌克兰移民。其名字总是和许多社会的领域连结在一起，特别是他几乎就是科学社会学的同义词。所谓的“Merton式的科学社会学”广泛地被科学社群所接受。他也是第一位得到美国科学的最高荣誉——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的第一位社会学家(1994)。他专注在“中程理论”，而非大理论或是抽象经验主义，从日常生活中去建立概念。他和同事发明了“自我实现预言”、“角色模式”、“焦点访问”(后来被误用成“焦点团体”)等概念。1942年他专注在发展“科学之精神特质”(ethos of science)的研究上，以及这些价值如何影响了制度内的科学行为。此外，Merton的研究早已超出学院之外，包括影响了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其发明的概念：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指的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也广为人知。这个源自于圣经的词，原本是在阐述科学中的一种现象：那些原本就拥有权力、经济或社会资本的人，会累积更多这些资本或权力。Merton的100周年纪念论文集由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St Petersburg Branch和RC23共同出版。 ■



Robert Merton,
1910-2003.



2003年世界社会论坛反对水资源的私有化

> 面对水资源的 不正义

by José Esteban Castro, Newcastle University (UK), ISA 计画委员

1980年联合国的Water Decade设立了一个目标，就是在1990年之前要每天提供40公升干净的可饮用水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很显然这个目标没有达成。1990年，世界上约有17%的人拥有甚至不到1公升的干净水源，同时也有40%的人没办法使用最基本的下水道设施。然后，联合国在2000年采用了Millennium De-

velopment Goals (MDGs)。和Water Decade比起来，这项计画就小气得多，甚至倒退，这或许是在1990年之后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开始占据支配地位有关。

MDGs对于水和下水道设施的构想，是要在2015年将那些没办法享用此资源的人口减少一半。虽然有些学者声称这一新目标更加务实，

但是实际上却是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将有数以百万记的人类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因为缺少干净水资源而死亡。事实上，联合国监督这项计画的报告中指出，未来的情况将持续恶化。虽然许多国家达到了干净水资源的标准，但是可能在下水道设施的部分就无法满足。更有甚者，我们可能未来达到MDGs的目标而牺牲了环境，因为更

>>

多的干净水必须用以满足目标，水流量会明显增加。若我们考虑全球南方只有5%的废水在排出之前有处理过，在考量环境成本下，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为了满足MDGs不仅仅需要大量经济和财务上的努力，也有着相当棘手和长远的伦理与政治问题。

> 社会斗争和公共财的商品化

关于这个议题，一个国际性的困境是：有人提议将每日最低干净用水量设为人权，可是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特别是那些全球北方的国家。虽然在2010联合国最终还是通过了这项人权提案（由于许多反对者弃权投票）。这也和1980年代主流公共政策在推动一种概念，就是解决供水危机是私有化和商品化核心，这要扬弃最低供水量等公共财的理念。虽然最直接的水的私有化政策打败了许多国家，但是商品化的过程是无情的，且和公有、私有、或是公民社会对于水资源服务的提供者之认同是独立的。公营事业必须像个私人企业一样，将经济效率（利润）置于社会效率（如毫无差别地提供水资源给每个人）之上。再者，许多公共操作者必须进入到公—私的伙伴关系之中，通常不过就是不同名称的私有化，目的是为了得到投资资金。这种种问题，包括了贪污、无效率、无责任等的公营事业缺点，以及不仅是在贫穷国家，持续是社会与政治对立的根源。

对基本水资源的取用是文明生活的基本面象，但是大

多数的人却被排除在外。我们上述所提到问题不过是结构性不平等与不正义的冰山一角，点出了人类与水资源，特别是自然环境的关系。在不移除水资源的课题为前提之下，我们还是要用许多篇幅描述一下现今状况基本样貌。然而有许多特别的议题值得提出讨论，包括了不受控制的露天采矿，这从1990年就延伸扩展到那些非传统矿区的国度，像是拉丁美洲。现在，从墨西哥到巴塔哥尼亚的露天采矿破坏了冰河、森林，污染的水和土壤，有氰化物和汞等有毒物质，毒害了与多人。这样持续性的社会抗争的根源包括了：持续的破坏森林会对水的地理系统产生严重的后果，也会影响人类社群和全球气候变迁。大量水资源的基础建设包括了水坝、河流改道、水道等。对水资源生态系统的破坏，像是红树林，湿地等，则为商业活动拓展了不小的空间。

> 面对水资源分配的不公不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强调科学知识的转型潜力，此一过程有两方面的性格：他们值得成为研究的知识对象，但是这样的知识也相当实际、物质、而且是基础的政治后果，不论被承认与否都是如此。这是一个现在内部、以及跨学科领域去研究在拉美和加勒比海水资源不平等和不正义的基本前提，有个研究的网络WATERLAT (www.waterlat.org)，此一研究的方法可以用3个假设来解释：

(1)关于水的治理和管理有其

资本主义性格。事实上，和水的治理和管理有关之日益增加的结构是由资本积累所驱动。有些考量，像是处理环境无法永续、不平等、不正义等的需求，其动力都是来自于资本积累。

(2)与水资源关系的无防备性的社会生成。我们治理和管理水资源的方式，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危险与危害。这些危险和危害来自于几个原因：无法取得干净用水、基础的供水设施遭受到许多由人类所造成的灾害（如洪水、干旱、各式污染）的破坏。尽管科技日益复杂，但是这样的危险和危害仍是当今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WATERLAT的重点不仅仅是对人类脆弱性的研究，更是强调人类无防御能力的社会生成，以及如何影响到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

(3)透过对水资源运用、管理、控制，以及对水之相关知识的生产、使用的民主化，以此方式来解决无防备能力的问题。WATERLAT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将学术和社会运动结合，去民主化水资源相关的活动。这里的行动者包括了政策的制订与执行者、水资源管理者、社会欲动、工会、环境组织、原住民社群等等。

WATERLAT在2010于巴西Sao Paulo举行了为期3天的国际型会议，主题是“社会与环境正义的紧张关系：以水的管理为例”。这场会议来自世界各地，例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大黎加、厄瓜多、海地、义大利、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西班牙、瑞典、英国、乌拉圭

>>

、委内瑞拉等国，共300多人参与。并且有出版电子书，超过100篇论文(多数是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提供下载(<http://www.waterlat.org/publications.html>)，以及DVD记录会议活动，包括主题演讲和对参与者的访问，若有需要可以去信索取(email: waterlat@ncl.ac.uk)。

下一届年会将会于2011年10月24-26日在墨西哥举行，由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研究中中心主办(FLACSO Mexico)，其也是这个组织的伙伴之一。

今年的主题，第一天将会是“水的不平等、不正义、无防御性”；第二天则是“水与公众健康的不平等、不正义、无防御性”；第3天将会聚焦在“面对水的不平等、不平等、无防御性：X学科的挑战”。更多的资讯请见：<http://www.waterlat.org/AcademicEvents.html>

注：易受伤性(vulnerability)指的是容易遭受攻击而受伤；脆弱性(fragility)是一种容易被破坏的状态；而无防御

性(defencelessness)包括了问题的社会面象，意味着人类有一种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特性，意即被迫缴械。

> 青年社会学家，年轻的观点

by Ana Vidu,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我们在社会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天我们300位年轻的社会学家站在这里，对于这个学科的未来发展相当关键。” Junior Sociology Association的会长——一位研究生、年轻的研究者——为第4届Catalan Congress of Young Sociologists揭开序幕，会议于2011年4月29-30日在Barcelona举行。第一次参加的学生(学士、硕士、博士)来自Madrid、Granada、Malaga、Valencia、Catalonia等地。约90篇论文，主题涵盖了认同、种族主义、失业、民主、性、生

态等，向同侪及教授报告。会议由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潘毅教授的演讲开始，她描述了年轻的中国社会学家投身到劳动剥削的研究和批判。当她提到社会学可以为更民主的社会贡献其力时，观众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她也鼓励我们建立一个年轻社会学家的全球网络。

在“社会学的未来”圆桌论坛中，我们辩论社会学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公共服务。“我们必须停止去分析那些我们早就知道的事务，停止发表那些没什么公共意涵的主题，而要专注

| Catalonia的青年社会学家

于社会的需求上。也有讨论社会学专业化的场次，分享来自应用或学术的知识和经验。我们也讨论了这个学科专业的未来，以及共同和像是Catalan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Sociologists and Politologists这种组织合作的可能性。

这场会议集结了一群年轻的社会学者，他们共同追求科学的严谨以及具有社会意义的社会学。日后将会有网站，就像现在已经有的Facebook和Twitter一样。最后，会议的晚宴是另外一个可以让我们辩论、讨论计画、交友，和跳舞的好时机！

> 西班牙革命中的社会学

by Teresa Sordé,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和 Tatiana Santos, University of Girona



Catalunya Square, Barcelona –这个广场已经被人民占领了！

华盛顿邮报称我们在5月15日展开的运动为“西班牙革命”——一场影响力扩散到西班牙之外(最远到日本)的运动。公民利用公共空间去辩论住屋、健保、教育等其他的社会议题，并且最后达成了共识。人们透过“对话式”(dialogic)的民主去阐述每一个特别的计画。这是一场公民社会内部的讨论，也是一场不同于既有政治制度的讨论。其中一个最广为流传的理念，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我们”(no-body represents us)。因此，5

月15日的运动以公民社会的自发自我集体组织为基础，发展出了特殊的政治形式。因此，公共空间对所有不论来自什么文化、年龄、教育程度的人开放，每个人也都有平等的发言权。

我们在Barcelona的Plaza Catalunya (Catalunya广场)找到了符合这个需求的公共空间，提供给我们的运动一个最佳的集会场所。在那里最重要的就是每天的全体会议(General Assembly)，这是由运动的各个委员会所组织而成的

。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可以选择要加入那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并有人全天候协调会议的进行。若有歧见，那么该议题就会进入下一轮的会议讨论。若在全体会议中对某项议题有所歧见，那么该议题就会回到原本的委员会。有不同意见者会被邀请去发表看法。此外，有一个特别小组会去规划全体会议的议程。

这样的“实质民主”透过了社会网络而得以进展、传播

>>



Catalunya Square, Barcelona - 一般會議

、扩张，特别是透过了Facebook、Twitter、部落格、网站，以及线上论坛等。在网页上于24小时以前公布各委员会议的时程和全体会议的议题，线上论坛也会同步进行辩论。总之，由人民自己去决定什么是重要的议题，例如，即使最高法院和宪法法庭不同意这个集会，但是人们仍然决定要在广场上继续下去。

有许多社会学家参与了这场运动。我们去的目的在于告诉大众什么才是正确的、应该的，因为很显然这种态度和立场和此运动的精神背道而驰。但是我们也不是只有去参加却对辩论毫无贡献。广场上的公民非常希望我们把社会学的视野带进讨论

之中，所以我们发展出了一种对话的民主机制，也是在实践公共社会学。

有些人持着一种反社会学式的“自发主义”观点，认为没有人预见这场运动的发生。我不同意，因为我们在4月12日去发动了一场我们称之为由下而上的革命，以直接民主为诉求，在网路上号召大家。其中一位社会学家指出了经济与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在非洲北部发生的多起革命为例，说明来自各地、不同背景的人如何共享着相同的愿景与梦想。他甚至订出了集结的时间一月26日到5月31日之间。从那时开始，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去进行动员，散播我们的理念，想促成这场革命运动。

所以，社会学家积极地以自己的预测去行动，参加广场的集会，充分应用其丰富的社会学知识。不过，并不只是我们的社会学对这场“西班牙革命”有所贡献的，其对于丰富社会学的理论意涵也相当重要，因此我们也才能够更进一步去理解此一对话式的民主运动。

> 全球劳动——来自南非的观点

by Edward Webster,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South Africa, ISA前劳工运动RC主席

英国历史学家E.H. Carr说过，一个人所看到的东西，会因为所处的角度不同而有所不同。而我站在非洲的最南端——Johannesburg，黄金之城。这是一个在全球化第一阶段——在19世纪末的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建立起来的城市。

本篇我将会阐述三件事情：(1)从南方观点，提供如何去理解全球劳动的社会脉络；(2)讨论我自己对于工人的全球再结构之影响的论点；(3)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去理解在全球南方为何会出现反向全球化运动(counter movement)。

> 社会脉络

工人团结的概念，例如，宣称优势者应该协助弱势者，必须回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开端。这是马克思有名的标语：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

在南非，要求工人团结的呼声以一个特别的形式出现：在1922年的大罢工事件中，白人工人以标语“全世界的工人为白人的南非团结起来”进行动员。

那些早期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从欧洲引进了工人世界主义，但却无法说服白人工人，也就是他们的殖民者。而他们的命运是和黑人工人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被殖民者。白人工人以被黑人廉价劳动力取代的诉求，为自己的利益辩护。

这种工人阶级的分化，是劳工团结的核心挑战。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同质的无产阶级。今日和19世纪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一份条件差的工作至少比没有工作好。

但是有件事情值得一提，就是黑人工人长期以来成功地组织且参加了工会。他们的奋斗历程是一段长期、艰辛、努力和不肯让步的雇主以及敌对且暴力的种族隔离国家对抗的历史。

他们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跨国的团结连带。那场对抗南非政府和实施财政许可的战役相当重要，因为他们努力说服政府和以Nelson Mandela为首的非洲国家议会进行谈判。跨国团结的例子，像是在San Francisco的码头工

人拒绝卸载南非船只货物，就是很好的证明。

1994年非洲国家议会的胜利，是一场不稳定的胜利。因为那个时期世界上的权力核心已经转向资方。南非那时正在经历一个双重的转型。一方面是民主转型，劳工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那时国际上都在削价竞争，向中国的低廉价格靠拢。

> 全球再结构化的影响

对劳动力而言，全球再结构化的过程始于民主转型，让劳动市场创造了越来越不安全的劳动力。这是在我们的Grounding Globalization书中所检视的主题。我们以白人商品(像是冰箱、洗衣机等的生产)以及来自3个国家、3个工厂的案例，去说明全球化的竞争如何谓工人带来的更不安全的条件。

- (1)在Electrolux Australia的例子中，我们发现了因为福利国家而裁员和退休的状况。
- (2)在南韩，LG的工人以更卖命的工作去回应全球化的竞争。
- (3)在南非，工人回到家庭中，以便可以从事更多非正式的经济活动，以求生存。

我们以Polanyi的概念来为这个双重运动定位，并认为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是一场第二次的巨变。我们或许找到了保护社会不受去管制化之市场侵蚀的方式和动力，然而，这些对于全球化的回应仍是在地的。唯一一个以全球的方式去对抗全球再结构化的例子，就是在澳洲Orange的Electrolux工人。他们透过网际网路和在Greenville (美国Michigan的一个小镇)的Electrolux工人，以及在瑞士总部的工人取得联系。但是这个建立工人团结的尝试最终失败了。瑞士总部的工会和管理阶级的关系太过于紧密，以致于无法看到在中国设厂的优点。不过，对于下一步来说，这或许是“成功的一次失败”。别忘记在Montgomery的罢车运动经验。如同Aldon Morris所言，最后一次的成功运动，总是要历经许多次的失败才得以可能。

> 跨国团结的意义

要思考跨国团结连带，首先要去区辨3种不同的团结类型。

第一种是我们称之为“人道主义”(humanitarian)的类型。这是团结连带主要是去支援那些遭受人权迫害的人，像是种族歧视、童工等。这类的团结连带很大一部份是诉诸于道德。而就像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称工一样，这种类型的团结也相对地有力。这个类型可以采取消费者运动形式出现，或是对抗Rio Tinto争取基本工人权益的运动那样。这种运动若在网路时代去组织，是相对容易和成本较低的。

第二种跨国连带的形式是“生产方式”(production approach)。这样的团结连带主要是工厂和工厂之间为基础的形式。在澳洲的个案中，我们为发现这是最困难的组织方式，因为跨国的生产已经在国家之间造成了恶竞争的逻辑。若是GM的工人罢工，则其他公司会卖得比较好。尽管如此，国际间的团结连带还是在成长中，例如Volkswagen的全球工人每年会集结去讨论他们在德国、巴西、印度、南非等工厂的需求。航运业的工人是最早进入全球集体议价模式的一群人。来自世界各地运输工人的检查员在卸载车辆的时候从事检查，如此一来他们可以，也是历史头一遭能够争取全球最低工资，并应用到全球各地的航运业上。

这样跨国组织的新形式挑战了20世纪常见的传统以国家为基础的工会组织。相较于以前的跨国连带模式，新模式较难透过专门的跨国部门组织起来，也更可能在领导者和工会间建立。透过电子邮件和Skype稳定和直接的沟通，新的团结连带形式更去中心化，更由下而上。

第三种团结形式我称为“管制方式”(regulatory approach)。这个方式不试图去集结世界各地的工人，而是去建立一种法律上的共同体—全球的权利和标准。最终目的是去规范管制市场，而不是取代市场。如同Peter Evans所说的，要让市场成为社会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一个可以在全球南方实施的新点子，叫做全球社会保障(global social floor)。例如健康保险、孩童津贴、或是最低收入的保障，不论是透过工作的现金的保证。这些是一种社会政策的当代创意，在巴西、印度、南非被实现了。

这些新政策孕育了反向全球化运动(counter movement)—一种由上而下的社会运动。国家透过NREGA去提供保障农户每年100天的工作天。这让每户人家拥有了工作权，提供工作证给他们。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不过就是提供多

一种选择的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社会保护系统逐步扩张的第一步。

重点是全球化对于跨国组织者来说，并不只是限制，还是机会。全球化被以权利为基础的论述而加速进程，也就是导致了由下而上的运动模式。在最近非洲北部诸国的例子可以得到印证。

但是，最有创意的组织是以跨国网络的方式呈现，例如在南非Durban的StreetNet International。它把零售商集结起来，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可以在公共场合贩售商品。

我们并不是在全球化与在地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在两者之间来回移动。这种结合方式，是Sidney Tarrow所谓的“在地的世界主义”(rooted cosmopolitans)。

借着连结全球生产和全球价格，大企业变得越来越脆弱。在南韩生产的一个引擎零件，若是延迟运送，就会导致在澳洲的组装进度落后，于是可以迫使两国的资方上谈判桌。这和30年代在Detroit的福特公司所面临的状况有些许类似。总之，新的运动力量和形式在全球化的年代里浮现了。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行动称为反全球化霸权运动，还言之过早的话，我们就得好好重新思考一下我们这个研究计画，重新思考全球资本主义、跨国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劳工和社会运动的议题。这样的新研究计画必须要有多个层次的分析，才可以对反向全球化运动的建立有所贡献。 ■



念被广泛用来形容中国在全球化生产上的能力。当资本家到中国设厂，他们要的不只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他们还要勤奋、熟练、教育程度高的中国民工，因为这些工人愿意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非常适合即时生产，并且同时是全球商品的潜在消费者。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因此也是新兴工人阶级诞生的基础。

世界上的工人彼此相互竞争，比赛谁可以接受最少的工资和利润，以及最差的劳动和居住条件。在这场竞赛中，中国似乎是最底线。SA-COM (大学师生监督无良企业行动)——一个企图连结学者和工人抗争的跨国组织——在过去10年内已经记录了许多跨国企业侵害中国劳工权益侵害的事件。积欠工资、强迫超时工作、可怕的健康与安全条件等现象处处可见。这个资本主义的市场某种程度是被后社会主义的政府所允许的，并利用对于自由结社的限制和罢工权的剥夺来达成此一目的。

> 全球劳动——来自中国的观点

by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大再生产”迅速进展，造成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阶级关系的快速重组。Edward Webster (在这期的全球对话)论及了新形式跨国团结的可能性，以及对于劳工运动的影响。关于这点，我有同样的梦想，也非常愿意以全球的观点去脉络化中国的地方抗争事件。科技和资讯的进步开启了资本的高速流动，并且跨国的新劳动力仍持续地动摇着既有的阶级关系。然而西方学术传统所谓的“告别无产阶级”或是“阶级分析的终结”，仍然没有让阶级关系消失，反而阶级和阶级冲突的议题随着资本一起进入的第三世界的社会里面，使得中国成为相关

社会抗争的前线。

> 中国的新兴工人阶级

过去30年来，改革开放和全球资本一起把中国转变成一座世界工厂，并创造出数亿人的工人阶级。藉此和国际劳工运动结盟，虽然不乐观，但是我们还是要抱持着不气馁的精神去面对这场全球化恶梦。若中国现在是全球资本家所觊觎的对象，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毫无限制资本积累形式，我认为，这同时是新兴工人阶级的一场全球化恶梦。他们的反抗现在才要开始。

近几年来，世界工厂这个概

> 中国的境内移工运动

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正在经历变迁与再结构化的过程。改革开放时代已经见证了阶级分化、阶级冲突、贫富差距扩大的发展。从属阶级因为缺乏发声的管道，所以现在只好动员大众抗议去表达其不满以及对于压迫的反抗。一项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99年和2005年间，全国性的抗议事件大约从10000件增加到87000件，每年增加几乎20%。此外，参与抗争的人数也从730000人到超过了3百万人次。并且要

>>

注意这之中有75%的抗议是由工人或农民所发起。除了次数之外，平均的大小、规模、组织程度也都有增加。

中国阶级关系的进一步分化也可以见诸于现在许多的劳资冲突和日益蓬勃的劳工运动。集体抗议的形式，例如诉诸发放津贴的游行，被欠薪的工人封锁道路，集体法律行动等，都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无论在私营企业、外资、公营企业，抗争日益白热化，有时示威者甚至会攻击政府的建筑物，并和公安警察爆发流血冲突。证据显示工人越来越积极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且他们会以各种方式(不论是个人或集体、直接或法律)进行动员。这意味着工人的集体行动不再只囿限于使用体制内或法律的方式去争取自身的权益，而是透过罢工、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等方式，了解何谓“激进化”的过程。虽然有组织的阶级实力之发展受到限制，但是工厂层级的罢工、停工、集体薪资议价、集体发声等种种用来吸引媒体兴趣、甚至攻击国家机器等的方式，已经是工人的常用手段，目的在表达不满，要求变革。

➤ 面对劳工抗争的挑战

中国的工人阶级抗争，很明显地受到结构性条件的限制。我曾经说过，新兴工人阶级已经经历了一场无止境的(半)无产阶级化，但是现在新生代则正在其所工作的工业化的城市中，经历一场巨大的“精神封闭”(spiritual enclosure)。

劳工的世界史告诉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会把农村工人的第二、第三代(进城工作)连根拔起。这样的无产阶

级化，把农村劳动人口转变成工业劳动力，并且剥夺前者的生产工具。事实上这也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史。结果就是工人的命运取决于资本积累的进程以及劳动商品化的程度。这些工人不但无法拥有，也无法控制工具、原料，以及自己生产的商品。

当中国转变成为世界工厂以及现代的工业化社会的同时，也重现了许多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常见景象。中国特殊之处在于其特别的无产阶级化：为了整合中国社会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政府设立了户口制度。这和南非的种族隔离类似，因为它要求工人在城市里面工作，却不能合法住在城市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工业化和都市化仍是两股不相干的力量，因为工人无法住在其工作所在的城市，也无法在其居住地工作。地方政府也从未想要帮忙解决工人在居住、教育、医疗等其他社会需求上的问题。移工是在法律上，而非现实上，被户口制度禁止住在城市里的一群人，并且阶级的界线也使得他们只能拿到很少的工资，根本住不起都市。总之，这种无产阶级化是在空间上，把生产局限于都市，再生产限制在农村，以达到隔离的目的。这个制度造就了一种宿舍劳动体制，结合工作和“家”，和早期资本主义工作和居住的安排类似，但仍然持续把工人和城市隔离开来。

结果产生的是一种未完成无产阶级化，这意味着是一种不完全的转变——农民工(半个工人)。个体因遭受到不当的对待，被迫要接受“流浪”。对于工人的第二代而言，都市和工业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无处可停留，就像工人所

写的诗：“你说，你终其一生，注定要漂泊流浪。”一旦走上这条不归路，你既非农民、也非工人，什么也不是。“永远别后悔，即使你必须承受这一切巨大的苦难”——这是新生代打工仔(正在想办法克服他们的不完整经历)的座右铭。

➤ 结语

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化创造了一批新兴的工人阶级，且他们正在尝试各种型式的集体行动。第二代移工的“封闭”也促成了南中国的罢工潮。

我们已经发现了二代农民工的自我觉醒、愤怒、和集体行动，也注意到这些工人正好处在控制和支配的中心，使得他们必须协商和接合本身的行动。尽管存在着结构性障碍，工人阶级每天以集体的形式反抗体制，威胁到了资本家，并让国家下定决心要镇压他们。

> 全球劳动—— 来自墨西哥的观点

by Enrique de la Garza, 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 Mexico City

Edward Webster提出了一个古典但切时的
问题：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全球
劳工运动的全球连结是否可能？而在这
种连带中，建立其他认同与团结的重要性又是
什么？

虽然Webster着重在“南方”，我认为他的分析超越了传统的“发展—未发展”的二分架构，这不仅仅是因为已开发国家(如澳洲)也在南方出现，而更是因为北方的许多国家也有着南方的特征。基本的议题仍然还是聚焦在如何克服工人之间的分化、由于族群、宗教、民族、甚至是职位(正式vs非正式，受薪vs非受薪，跨国企业的工人vs本地企业的工人，正职员工vs派遣员工)差异而带来的分裂。因此在这个意义下，Webster的论点是正确的。全球的资本家竞相削减成本，所带来的压力大到让工人没有办法喘息，于是只好被迫接受权利和保障的丧失，以好继续存活下去。这种生存策略也有可能导因自工人认同的分裂。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这段历史学到许多课题；

(1) 关于认同分化的理论，假设是由于职业的差异(Claus Offe)，或是劳动轨迹的分殊(Zygmunt Bauman)而导致，然而这种解释终究过于表面，因为职业、公司、分公司、地域、国家、国际的差异始终存在着(第一国际的成员组成在职业上有很同质吗？人民前线的组成有很同质吗？)认同形塑、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过程并非只是取决于行动者的职业位置。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结构的确导致了集体的差异建构，但社会认同也来自于社会互动、社会运动、文化、被镶嵌的主体性。

(2) 从工人的立场来看，跨国连结的物质意义早就存在于全球价格炼中了，包括了现在的许多冲突，像是契约转包或是海外设厂。虽然这样的物质连带并不保证带来团结，不过还是有存在的例子。

(3) 有大量的工人处于全球价格炼之外，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受薪或非受薪、传统或现代的工人，皆是如此。我们必须去问全球劳工运动是否可以避免这种排他性认同的问题。

以拉美为例，其问题类似Webster的提问。无论在哪个案例中我们都必须要指出非正式部门的重要性，因为其并不在劳动管制范围内。按



加拿大的钢铁工人声援墨西哥矿工

照国际劳动组织的新定义，拉美的非正式雇佣以及缺乏劳动保障的比例是总劳工数的40%到70%。非正式部门包括了大企业和小公司，但最常见的还是在总人数少于5人的公司里面，而且这种小公司是拉美的多数常态。在这些部门里面，部分的劳动力是受薪阶级，但多数是家庭内的自雇者，并没有领薪水。领取佣金的受雇者也算在内。因此，劳动管制就很重要了。工人在全球价格炼中的位置也是一个关键的议题，并要探讨正式员工和派遣员工之间的关系。

如同职业差异一样，劳动立法和劳工组织的政策，在各国也有所不同。关于劳动立法，我们可以区分成两组，其一是采取传统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其二是那些采用替代性政策的国家，像是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巴西。工会力量和劳工权益的衰退，对于第一组来说是个重要的议题。至于第二组，工会和劳工保障有复苏的迹象。在90年代期间，当新自由主义几乎席卷整个次大陆时，劳工的保障退步了不少。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在许多地区情况却进步了许多。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有些国家的劳动法允许非受薪阶级组织工会，但是有些国家则不允许。

在工会政策的部分，其实有些地方和前述是类似的。虽然有些工会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并没有提出什么重要的反抗策略，但是还是有非常反对的例子存在。此外，有些工会非常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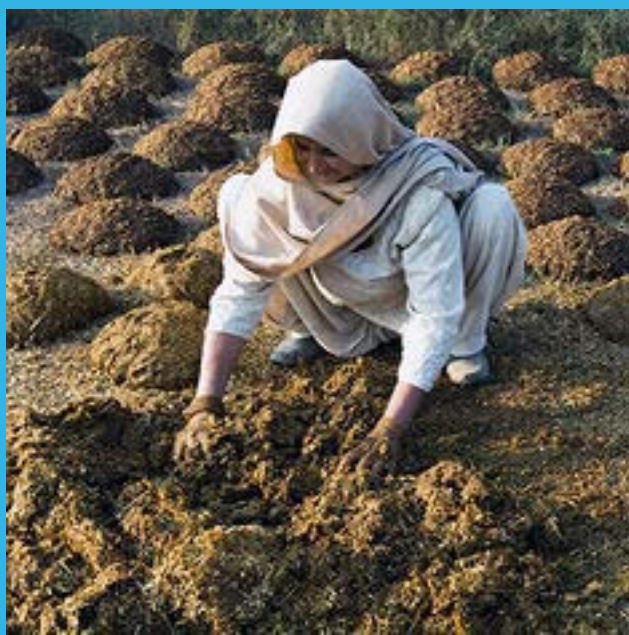
持对于劳动的狭义定义，认为是该是受薪的劳工，但仍然有些人采用较为宽松的定义。最重要的是，虽然才在初始阶段，国际团结连带是透过大型的全球联盟、透过分部组织、透过针对特殊问题社运战役，使用政府之间的协定(例如ILO)或是其它贸易协定，才得以建立。

换句话说，Webster所提出的那些已经存在的跨国连带形式，如人道主义、生产方式、管制方式等，都相当重要。但是集体行动和认同的“液化”(liquification)所带来的影响，并不需要以职业结构、劳动轨迹、或是至是全球市场压力的视角来看待，反而可以以工人乌托邦消逝的角度观之。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是社会民主党人士等同样有着类似物质基础、支持资本主义以外的选项的人，并没有被取代，也没有被淘汰。

最后，不同但可行的改革方案或许可在同一

个新自由主义系统中出现，就像Webster所说的3种连带形式。这被限定在金融体系的管制上，或是一种全球层次的时代错误投射(例如世界社会论坛)。现在似乎还不是思考汇聚、将其转换成全球计画的时候，不论在知识上或是具体规划上，皆是如此。 ■

> 埃及捎来的信： 论滚牛粪



1 牛粪抽样

我 之前的一位学生，现在正在南苏丹的Juba工作，他写信问我：“

我正在想要怎么解释什么叫做滚雪球抽样，因为这对没看过雪球的非洲人来说简直是场恶梦。

所以我就解释滚雪球的过程，怎么最后雪球会越滚越大，并且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球会越来越大，若有，那就可以为这种抽样方法取一个非洲的名字。

一片沈寂之后，一位学生站起来说：那是我们滚牛粪的方式！

因此，滚雪球现在可以叫做『滚牛粪』了。”

我想，或许你会想与你ISA的同事们分享这个点子，特别是Michael Burawoy。

Regards,
Ray Jureidini
移民与难民研究中心，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

> 介绍Paulista编辑团队

我们将在往后的每一期介绍一组《全球对话》的编辑团队



由左至右：Juliana Tonche, Andreza Galli, Pedro Mancini, Renata Preturlan, Fábio Tsunoda, Dmitri Fernandes, Gustavo Taniguti.

能够在此跟世界各地的读者介绍《全球对话》的巴西编辑群，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我们也很高兴透过这份通讯跟大家交流社会学的资讯与经验。希望这个对话的园地将会越来越蓬勃发展。以下简短介绍我们的团队—Paulista。

Andreza Tonasso Galli从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USP)的国际关系系毕业，现在是社会系的研究生，研究兴趣是种族关系和黑人运动。她也参加大学的一个延伸计画：“Educar Para o Mundo”，研究关于大众教育、移民和人权。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拿到的第一个学位是社会科学(2004)，之后则是社会学的博士(2010)。2008年他拿到FAPESP奖学金，在法国巴黎的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从事社会学研究，发展他关于社会史的博士论文研究：1970年代森巴的象征性再现和非裔巴西人文化政治的关系。

Fábio Silva Tsunoda有Universidade Estadual Paulista (UNESP/Marília)的社会科学学士学位，现在是USP的博士生。他从事巴西日本移民的研究，兴趣包括了工作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移民。同时也是Plural这份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并且也是Núcleo de Antropologia

urbana’ (NAU-USP)这个都市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研究员。

Juliana Tonche是Universidade Federal de São Carlos (USFCar)的社会科学学士，并且攻读过硕士学位。现在则是USP的社会学博士生，专攻修复式正义的倡议运动。她的兴趣包括了冲突管理和惩罚社会学。同时也是下列组织的成员：Núcleo de Antropologia do Direito (USP)、Grupo de Estudos da Violência e Administração de Conflitos (UFSCar)。

Pedro Felipe de Andrade Mancini是USP的社会科学学士，现在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研究关于社交媒体，在虚拟世界中的社会交际。此外，他也是Plural这份USP研究生社会学刊物的编辑。

Renata Preturlan 是USP的社会学硕士生，研究关于São Paulo的玻利维亚移民。她是USP国际关系学士。也是都市人类学研究室移民小组的成员，参与延伸计画：世界的教育。



伊斯兰遇上社会学 - Seyed Mohammad Saghafi 博士, 神职人员, 在Azad University 教书; Gholamabas Tavasoli 博士, 伊朗首席社会学家

了19、20世纪伊朗和土耳其的思想家, 并建议可以汲取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去建立中东社会学。此外, 正如Biuk Mohammadi所指出的, 中东社会学的源头不该被狭义的定义在社会思想, 还要延伸到文学领域。这样一来, 中东社会学就不是忽视西方思想, 而是更有创意地吸收其精髓; Özer-varli则以19世纪土耳其思想家为例, 说明他们如何做到了这件事情。

另一个核心议题是伊斯兰教与社会学的关系。Riaz Hassan以其丰富的教学研究经验说明什么是伊斯兰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Islam)。当然这也不可避免的会有神学和社会学取径上的矛盾问题, 特别是当我们要解释伊斯兰教的起源时。Riaz Hassan则发表了一篇详细讨论此一主题的论文, 并且和伊斯兰社会学(Islamic Sociology)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过同时也有许多其他神职人员进一步阐述伊斯兰社会学的观点, 并且对西方的社会学站在比较敌视的立场。

与会人士都热切希望这个会议可以每年或是两年举办一次。而现在也正在规划下一次关于中东社会思想的会议, 将会在Istanbul召开, 可能的时间是2011年。然而, 为了符合此一会议之批判精神, 也有人建议扬弃掉“中东”这个概念, 因为用这样一个带贬低意味的字眼一如同荷兰殖民经济与社会史学J. C. Van Leur所说的一种来自于“船上的甲板、城堡的堡垒、贸易中心的画廊”的优越态度与观点一来称呼这个地区, 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 动社会学在中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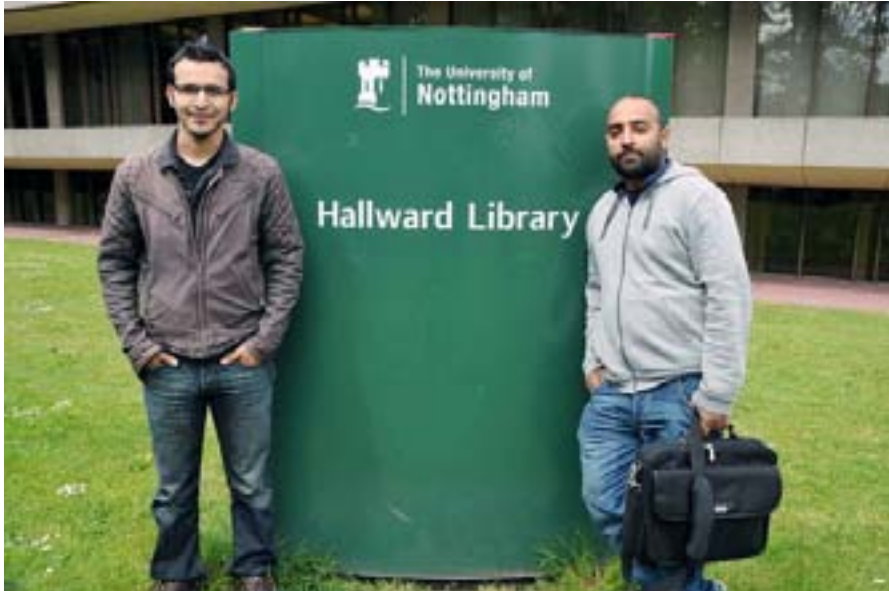
by Syed Farid Alatas, 国立新加坡大学社会学系

今年的5月28日和29日Tehran举行了一场名为“当代中东的社会学与社会思想”的会议。这可能会成为这个地区的社会学例行系列会议。此次聚集了来自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的社会学者参与, 并且由伊朗社会学会和ISA主办, 且由Istanbul Foundation for Science and Culture、伊朗的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Mashhad的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Thought、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and Collaboration、Jamee-Shenasan Publications的Social Sciences Faculty Branch等单位共同筹办。大约总共有50多篇论文发表, 半数是用波斯文。

会议由Michael Burawoy和伊朗首席社会学家Gholamabas Tavasoli的演讲揭开序幕。Burawoy教授认为这场会议非常重要, 因为事关中东的区域社会学的建立。区域社会学不仅仅要理解国家内部的社会过程, 还有跨国间的议题。他认为中东地区是一个可以尝试建立全球社会学的重要场域, 理解地区将可以为社会学的

普遍化贡献到什么程度。Tavasoli与Burawoy的立场一致, 并特别关注其他非主流的社会思想观点, 例如, 他认为社会学里面的某些概念, 像是公民社会, 其实发源于伊斯兰时期(pre-Islamic)或是伊朗, 而非希腊。

在中东的社会学讨论总是非常具有批判性, 并且强调中东地区要找到不同于西方传统的选项。在这场会议中也不例外。Tina Uys、Sari Hanafi、Michael Kuhn、Ebrahim Towfigh等人的论文也讨论到了这些中东社会学所面临的问题, 例如东方主义或是学术依赖性。然而与会者也直接指出, 重点不应该摆在老是猛烈抨击西方, 而是要做出好的社会学研究。这意味着我们要超越西方视野的局限, 整合中东自身的观点, 并带进其他地方的概念。的确, 我们总是有听到对于本土社会学或是非主流社会学的要求声音。这场会议的新颖之处就在于不但回应了这些要求, 也说明了中东如何对于社会思想有所贡献。Sait Özer-varli、Mohamad Tavakol、Seyyed Javad Miri则讨论



> 戕害学术自由： Nottingham的案例 与告密者

by Alf Gunvald Nilsen, University of Bergen, Norway

在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oN)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让我们发现，学术自由——一种作研究、在公共领域发表结果的自由，免于受到惩罚、开除、或是侵犯公民权的恐惧——非常可能已经成为所谓“反恐战争”的牺牲品。

Rod Thornton博士出身英国士兵，是一位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暴动的专家，他在今年5月4日被迫解除他在UoN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SPIR)的讲师职务。原因是由于Thornton博士发表了一篇论文，宣称UoN的组织高层必须对错误逮捕两位无辜的穆斯林——Rizwaan Sabir (SPIR的硕士生)和Hicham Yezza (现代语言学院的职员以及Ceasefire这份政治期刊的编辑，他们在2008年5月被怀疑是恐怖份子)——负起责任。

他们两位被逮捕后拘留了6天，最后被无罪释放。整起事件肇因于Yezza的一位同事发现他的电脑桌面上有一份名为“盖达组织训练手册”以及另外两篇学术论文。Sabir原本下载这些文件的用途是为了撰写他的硕士论文，主题是关于激进伊斯兰。然后他把文件寄给了他的朋友Yezza，询问他的意见。最重要的是Sabir是从美国司法部的网站找到到那份手册的。

而Thornton博士在论文中并不是在分析那些文件被找到后的风险(按照政府的方针，这是UoN的任务之一)，而是详细的说明校方的管理阶层如何与警方联系，然后接着那两个人就被逮捕了。还不只如此，Thornton博士还说，在他们被释放后，校方还很努力地污蔑他们及其支持

者，好让那些质疑和挑战UoN的声明——文件是非法的以及逮捕是合法的一的声音可以消失。

UoN为Thornton博士的言论贴上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标签，并且说他诋毁他的同事。然而校方自己却从未拿出证据来。换句话说，Thornton博士的解除职务一案，是为了造成寒蝉效应。

Thornton的论文是一个细致的研究报告，其论证背后有扎实的资料为基础。他在超过112页的论文中提供了该校内部的言论记录，并且受到资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的保护，进行了3年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Thornton用尽了所有内部管道去表达他对UoN的不满。

可以肯定的是Thornton博士的报告、对校方的批判以及其行为，并不足以作为侵犯学术自由的正当理由。若以公平而论，他应该马上恢复职位，并且UoN必须把那些对于Thornton博士的宣称交付公共审查。

请加入Noam Chomsky以及其他人士，到S.W.A.N. 签名，支持其诉求(<http://www.thepetitionsite.com/1/support-whistleblower-at-nottingham/>)。